

# 俄国在耶路撒冷财产的起源、变迁及影响

邵 丽 英

**内容提要** 俄国于公元 11 世纪遣使进入圣地耶路撒冷,1847 年向耶路撒冷派驻宗教使团,此后不断强化在该地的宗教存在,购置地产,建设房产,建立起东正教徒在耶路撒冷的活动基地。俄国虽然以宗教形式进入中东,但其真实的目的和意图都是政治性的,反映出其称霸世界的野心。俄国在耶路撒冷的宗教存在和财产存在是其未来插手中东事务的一个政治支点。它这种以宗教为先导、扩大区域政治影响力的方式,值得充分注意。

**关键词** 耶路撒冷 宗教使团 俄国财产

耶路撒冷作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不仅是当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的焦点,历史上更是各大国以宗教名义向中东渗透的地方。俄国是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中东地区的?这个问题是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史中绕不开的问题。中国学术界传统上以公元 17 世纪晚期,彼得大帝推行向黑海沿岸扩张的政策为俄国进入中东的起点,进入方式是直接的武力扩张。俄国学术界一度也持这种观点。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正教在俄国复兴,俄国一部分学者开始将注意力投向耶路撒冷,强调早在 11 世纪初俄国就以宗教的方式进入中东的心脏地区。俄国学者遂开始研究这一时段俄国在中东的活动,并有论文发表;<sup>①</sup>但研究较为零散,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专题。在中国,中东关系史研究领域目前还未注意到这一动向。本文就耶路撒冷俄国财产的起源、变迁及影响展开分析,基本梳理出俄国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间与方式。1847 年,俄国向耶路撒冷派驻了东正教使团,并于 1850 年代建设房产,从 1860 年代开始购置地产,形成了俄国在耶路撒冷的宗教存在和财产存在。这种宗教存在和财产存在实质上是俄国在中东的政治存在的形式之一。这种存在一直延续至今,深刻地影响着俄国与中东的国际关系,并将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

## 一、俄国进入中东的动机及形式

俄国进入中东的最初原因完全出于扩张的政治需要。公元 10 世纪初,基辅罗斯兴起时,为争夺

---

<sup>①</sup> В. Ф. 特鲁特涅夫:《俄国外交与皇家东正教巴勒斯坦协会》(В. Ф. Трутнев, *Рус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Палести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Н. Н. 莫斯科 1992 年版; 里索沃伊:《俄罗斯圣地琐事》(Н. Н. Лисовой, *Русское дело в Святой Земле*) 莫斯科 2001 年版。

通往黑海的商路,与拜占庭帝国开始发生冲突,并日益表现出强势。公元907年,罗斯大公奥列格率军沿黑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进攻君士坦丁堡,迫使拜占庭帝国签订协议,同意给予罗斯商人免缴贸易税的特权,条件是罗斯人为拜占庭帝国对外征战时提供援兵。<sup>①</sup>此后,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直至罗斯人帮助拜占庭帝国在反击小亚细亚军队叛乱和保加利亚人的入侵中取得胜利后,拜占庭帝国同意将安娜公主嫁给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两国结盟。与此同时,弗拉基米尔为了能够统一基辅罗斯周边多神教的斯拉夫诸公国,决定接受一神教的基督教,以加强基辅罗斯的凝聚力。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下令基辅罗斯公国全体居民受洗,罗斯人由此进入基督教世界。可见,俄罗斯人是在国家政权力量的强制下整体性接受基督教的。这种宗教植入方式决定了教会对国家政权的依附性质,使俄罗斯东正教会始终是国家政权的工具。接受基督教不仅使俄罗斯增添了内部凝聚力,而且还增加了对外扩张的借口,从此以后,保护境外东正教徒就成了俄罗斯介入别国事务冠冕堂皇的理由。1001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派出第一个使团访问圣地耶路撒冷。此后经过近百年的时间,当十字军从穆斯林手中夺得耶路撒冷后,罗斯人也出现在圣地“朝圣”的人群中。通过最初与圣地的交往,罗斯人掌握了巴勒斯坦修道院和教堂在祈祷、圣餐、禁欲方面的经验。

基督教于1054年分裂为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语东部教区和以罗马为中心的拉丁语西部教区后,基辅罗斯归属于东部教区,与拜占庭帝国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友好关系。在这期间,基辅罗斯瓦解,在反击蒙古人入侵过程中崛起的莫斯科公国致力于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于1326年将罗斯教会总部从弗拉基米尔城迁到莫斯科。此后,莫斯科成为都主教的驻地、罗斯的宗教中心。当时,拜占庭帝国有四个大教区,即:君士坦丁堡教区、亚历山大里亚教区、安提阿教区、耶路撒冷教区。莫斯科公国由君士坦丁堡教区牧首公署任命都主教,莫斯科大公提出的人选只能作为教会领导的候补人选,莫斯科大公不想忍受这种从属关系。适逢拜占庭帝国从马其顿王朝末期开始逐渐走向衰落,莫斯科大公便寻求争取本国教会的独立地位。1439年,基督教会在意大利中部城市佛罗伦萨召开宗教会议,讨论解决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和解及确立教皇首席地位问题。由君士坦丁堡教区牧首委派的莫斯科都主教、希腊人伊西多尔参加了会议,他以莫斯科教会的名义签署了两教合并的协议。伊西多尔回到莫斯科后,向大公瓦西里·耶维奇陈述此次宗教会议协议的签署就意味着东正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合一,东正教会承认罗马教皇为“基督在世代表”,具有全权地位。瓦西里·耶维奇听后大怒,斥责伊西多尔是“拉丁教的魔鬼”,声称同西方教会和好并恢复关系背离了正统教义。随即下令将伊西多尔都主教撤职查办,逮捕入狱。1448年,在莫斯科召开了地方各主教会议,会议谴责了佛罗伦萨宗教会议协议,正式解除了由君士坦丁堡教区牧首公署任命的都主教伊西多尔,自行选出俄罗斯人约纳担任都主教,并冠以“莫斯科和全俄都主教”之称。<sup>②</sup>自此,莫斯科教会对拜占庭君士坦丁堡教区牧首公署的依附地位宣告结束。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拜占庭帝国灭亡,东正教世界各东方国家先后建立自主教会。莫斯科公国在伊凡三世统治下建立了统一的俄罗斯民族国家,莫斯科不再是公国的中心,而成为国家的首都,伊凡三世也从大公变成了“全罗斯的国君”。马克思对此曾作过评价,他说:“惊惶的欧洲,当伊凡在位之初,几乎不知夹在鞑靼人和立陶宛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

① 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2页。

② 乐峰:《东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159页。

这时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突然出现在它的东部边境而弄得目瞪口呆,甚至使欧洲发抖的土耳其素丹巴耶济德本人也破天荒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莫斯科公国人的傲慢的语言。”<sup>①</sup>可见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出现给世界带来的震撼之大。在这种形势下,已灭亡的拜占庭帝国的末代皇帝决定投靠俄国,1472年他把自己的侄女索菲亚·帕列奥洛格嫁给了伊凡三世。俄国人解释说,此举意味着拜占庭的精神遗产让渡给了俄罗斯,俄国成了东正教世界的领袖。到16世纪末,俄国甚至出现了“关于弗拉基米尔大公们的传说”。传说断言,按编年史记载,莫斯科王公为留里克的后裔,留里克是著名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兄弟普鲁斯的第14代孙。因此,俄罗斯皇族不折不扣地出自罗马皇族。传说还提及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他是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莫诺马赫的孙子,据说,祖父曾“赐予”他王冠,著名的“莫诺马赫王冠”即源于此。<sup>②</sup>

伊凡三世去世后,其子瓦西里三世在位时,普斯科夫城叶利扎罗夫修道院的僧人菲洛费上书,提出一种新的理论——“第三罗马”论。该理论宣称:“第一罗马(即古罗马)由于缺乏信心而衰落了”;“第二罗马(即君士坦丁堡)由于它同渎神的拉丁教会结合而陷落了”;“如今领导普世教会的历史重担已经落在第三罗马(即新罗马)的肩上了,这个第三罗马就是莫斯科,它是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的继承者,也是最后一个罗马。而第四罗马是不会有,因为第三罗马无限忠诚于东正教,所以它是万古长存的。”<sup>③</sup>俄罗斯作为世界东正教首脑由此有了理论依据。东方宗主教当时为寻求俄国的支持并构建强大的同盟,对此也加以默认。

统一后的俄罗斯开始大规模对外征战,在南方为打开出海口,与奥斯曼帝国交锋,伊凡四世时期致力于远征奥斯曼帝国属国克里木汗国;彼得大帝执政后,他迫使奥斯曼帝国允许俄国东正教徒参拜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圣地;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成为俄国外交的目标,并于1774年迫使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签订了俄土关系史上最重要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该条约对未来影响最大的是有关东正教在奥斯曼帝国地位的条款。条约承诺恢复几乎已被遗忘了的朝圣路线,并规定俄国可以在伊斯坦布尔(即君士坦丁堡)建一座教堂,其管辖权属于俄国;更加重要的一条是“土耳其帝国政府保证对基督教及其教会提供经常保障,并允许俄罗斯皇朝公使亦可为保护该新教会,随时提供意见”,土耳其政府对此应给予“适当考虑”。<sup>④</sup>由于这段话的准确含意一直没有得到澄清,俄国可以名正言顺地随意解释,从而推行干涉土耳其内政的政策。这意味着俄国获得了对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教徒的单独保护权。这一特权一直维持到克里木战争。

## 二、俄国在耶路撒冷财产的形成过程

俄国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开始在中东设立外交代表机构。1785年,沙皇政府在希腊各海港城市 and 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设立了多个领事馆和副领事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继承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皇位后,也继承了她的东方政策。1808年,圣地耶路撒冷教的一所教堂——圣墓教堂遭遇火灾损毁,该教堂主教派出使者——修士大司祭阿尔谢宁前往俄国,募集善款,修缮教堂。亚历山大一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页。

② B. B. 马夫罗金著,余大钧译:《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7页。

③ 乐峰:《东正教会史》,第161—162页。

④ 巴巴拉·杰拉维奇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7页。

慷慨解囊,拨款帮助修复圣墓教堂。也许是出于对俄国沙皇的感激之情,阿尔谢宁 1816 年致信亚历山大一世,建议在耶路撒冷建立俄国的修道院或教会会馆。亚历山大一世比较谨慎,对此项建议没有给出明确答复,而是派出使者到耶路撒冷了解那里的具体情况后,于 1820 年在雅法设立了副领事馆。19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东局势发生了变化,当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咄咄进逼之时,忙于与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争夺的英、法等国开始对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表现出浓厚兴趣,并在那里建立领事馆,兴建教堂、学校和医院。1839 年,英国在耶路撒冷建立了自己的副领事馆。1841 年,与普鲁士一道任命了当地的第一个新教徒主教,一年后又在耶路撒冷老城雅法门附近兴建了阿拉伯东方第一个新教教堂。1841 年,法国也在耶路撒冷设立了自己的领事馆;英国则在这一年派遣英国国会主教前往耶路撒冷。1846 年,罗马“拉丁宗主教”被派遣到耶路撒冷。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们共同致力于争取阿拉伯教徒的斗争,在叙利亚的安提阿东正教会甚至遭到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的攻击。东方宗主教为对抗天主教和新教势力的排挤,强烈要求俄罗斯东正教支援他们。俄国也视天主教和新教的攻势为新一轮向圣地的“十字军东征”,沙皇尼古拉一世决定采取积极的东方政策以应对西方的进逼。与此同时,俄国人对圣地的关注愈益强烈。教会活动家、宗教作家穆拉维约夫于 1830 年完成了自己的首次朝圣之旅后的作品《圣地游记》,在 15 年内 5 次重印。这部作品对圣地命运的关注引起俄罗斯社会的强烈反响,也在俄国掀起一轮朝圣热潮。在这种情况下,在耶路撒冷设立使馆提上俄国外交日程。

1841 年 3 月 1 日,东正教至圣会议总检察长普拉塔萨夫伯爵在呈交尼古拉一世的报告中写道:“至圣瓦拉涅日斯基(大主教安东宁)发来通知:所有从耶路撒冷返回的朝圣圣墓教堂的人非常同情圣地的处境,而且同时也会提到圣地生活困难,我们的同胞暂居耶路撒冷时甚至没有可以长久居住的处所。”<sup>①</sup>主教建议在耶路撒冷建立供朝圣者过夜的房舍。1842 年 6 月 13 日,副总理大臣涅谢尔罗德伯爵向沙皇提交了由巴勒斯坦领事巴济里建议的有关圣地事务外交措施的报告。<sup>②</sup>根据外交部门的提议,俄国派遣修士大司祭、后升任主教的波尔菲里(乌斯宾斯基)前往圣地。1843—1844 年,波尔菲里第一次在耶路撒冷游历了 8 个月。在这段时间,他详细了解当地的相关事务,并获得了掌管圣墓教堂和巴勒斯坦所有主教辖区及修道院的圣墓教会的信任。他发回国内的报告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必须尽快成立驻耶路撒冷宗教使团,作为在东方宗主教管辖之下的俄罗斯教会的常任代表机构。随后,又经过两年多内阁讨论和外交程序,之前由外交部而非东正教最高会议提交的成立使团的报告,最终于 1847 年 2 月 11 日由涅谢尔罗德提交,沙皇批准了该报告(苏联解体后的 1997 年教会曾庆祝这一天为使团成立日)。1848 年 2 月,波尔菲里率领使团第一批成员抵达耶路撒冷开展工作。在俄国驻耶路撒冷宗教使团的协助下,宗主教基里尔创办了隶属于十字修道院的希腊—阿拉伯语学校,并且任命俄国使团首脑担任所有宗主教教育机构的监察员(督学),同时开办了为阿拉伯东正教教民出版书籍的印刷厂。但不久因爆发克里木战争,使团被迫撤回国内。

俄国一直认为自己在奥斯曼帝国攫取利益应得到英、法等同为基督教世界国家的认可。然而,当英国和法国在中东也有了自己的直接利益后,俄国发现自己不仅没有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这些

① П. В. 别佐布拉佐夫主编:《主教波尔菲里生平资料》第 1 卷(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биографии епископа Порфирия Успенского/Под ред. П. В. Безобразова. Т. 1) 圣彼得堡 1910 年版,第 3 页。

② К. М. 巴济里:《土耳其人治下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К. М. Базили, Сирия и Палестина под турецки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莫斯科 2007 年版,第 15—18 页。

基督教国家反而与伊斯兰教国家奥斯曼帝国结盟共同打击俄国。克里木战争及其结局让俄国人明白,此后俄国再想向南面扩张时,所要面对的对手不仅是奥斯曼帝国,还有更强大的欧洲基督教国家。既然如此,俄国认为,自己也应该向基督教世界扩展去争取俄国的利益,而圣地在东方问题这一总体背景中意义重大,必须在圣地耶路撒冷强化俄国的存在。1856年,负责安排从敖德赛到雅法这一条朝圣路线的俄罗斯航运贸易协会成立,俄罗斯朝圣者数量激增。1857年,因克里木战争而中断活动的俄罗斯驻耶路撒冷宗教使团恢复工作。第二年成立了俄罗斯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虽然领事馆作为外交部门在工作中时不时会与宗教使团发生分歧,但外交机构在耶路撒冷的存在总体上有助于宗教使团在圣地开展工作。

克里木战争之后,宗教使团在圣地的主要工作是购买土地。这一工作的成果要归功于使团的第四任也是最著名的领导之一修士大司祭安东宁(1817—1894)。此人是乌拉尔边区一位乡村神父的儿子,19世纪杰出的教会学者,精通东方学、拜占庭学、考古学、古币学,并从事古代手稿研究。他于1865年9月11日抵达耶路撒冷,将自己生命最后的30年时间全部投入使团的领导工作。由于奥斯曼帝国法律规定不允许外国公民持有帝国土地的所有权,所以,安东宁指使自己的助手、俄罗斯驻耶路撒冷宗教使团翻译官——奥斯曼帝国臣民雅库布·哈尔别伊以他本人的名义购买土地,然后以还债之名转到安东宁名下。自1866年起,安东宁利用这种办法先后购买了雅法(现在俄罗斯的彼得使徒教堂和塔维法教堂坐落于此)、艾因—卡列门(现在的科尔涅斯修道院)、伊列昂(俄罗斯的瓦滋涅谢修道院)、赫弗洛(玛姆富力大橡树附近的教堂和修道院)的土地。因为这些财产一直在安东宁的名下,进入暮年后安东宁格外忧虑,自己时间不多了,这位奥斯曼翻译官也随时有可能调离耶路撒冷。俄罗斯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和东正教最高会议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外交部门当然希望安东宁将自己名下的不动产转交给国家,但是按照奥斯曼的司法程序这样做会极其复杂。1889年安东宁找到了办法,他利用伊斯兰沙里亚教法中捐赠财产的规定,即将私有财产捐赠给教堂、修道院或者宗教团体作为永久财产,从而使自己名下的财产合法化。这样,安东宁在去世前已达100万卢布的私产通过捐赠成为俄罗斯驻耶路撒冷宗教使团的财产,而通过使团又成为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财产,进而成为俄罗斯国家的财产。继安东宁之后的历任修士大司祭及其他宗教人士也都仿效安东宁的做法,从而使俄罗斯在圣地的资产不断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罗斯驻耶路撒冷宗教使团管理的土地共有32块,分别是:列入安东宁名下于1889年捐赠的6块;安东宁购买但并未列入其名下捐赠的8块;1903年任命的使团最后一任修士大司祭列昂尼德购买的土地16块;叶甫普拉科西娅和希拉耶娃两位修女捐赠的两块地产。此外,还有在这些地产上修建的教堂6座、修道院两座(科尔涅斯基和叶列昂斯基修道院)、会馆11所及一些比较小的教堂。<sup>①</sup>

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欧洲列强为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各国王室成员纷纷前往圣地朝圣。1862年,英国王位继承人、未来的国王爱德华七世,1869年普鲁士王储、后来的德国国王腓特烈三世,1898年德国国王威廉二世,1910年他的儿子——储君先后来耶路撒冷。俄国当然也不例外,1859年5月,亚历山大二世的兄弟——海军上将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爵妻子亚历山大洛夫娜·约瑟

① М. А. 季亚诺诺夫:《俄国宗教使团在耶路撒冷资金账目和不动产评估报表(1914年11月4日)》(М. А. Дьяконов, *Отчет по ревизии денежного 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 по обозрению недвижимых имуществ счетоводства и отчетности РДМ в Иерусалиме*. 4 ноября 1914г.); Н. Н. 里索沃伊:《俄国在圣地》(Н. Н. Лисовой, “Русско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в святой земле”),《祖国历史》(Омезесмл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3年第2期。

夫娜及儿子尼古拉访问耶路撒冷,并捐赠大笔资金用于修建教堂。1872年10月,沙皇的另一个兄弟尼古拉·耶维奇骑马在圣地驰骋上千公里,完成了自己的朝圣之旅;离开之前,还在圣地举行了俄国宗教使团三一大教堂的圣化仪式。<sup>①</sup>与前两次相比,1881年5月亚历山大三世的兄弟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的圣地朝拜之举意义更为深远。这次朝圣的理由是沙皇夫妇的悲惨离去,先是王后玛利亚·阿列克桑德洛夫娜辞世(1880年),随后是亚历山大二世被害(1881年3月1日)。由于王后在世时的健康状况可以断定她不可能实现自己朝拜圣地的梦想,朝圣者用她提供的资金在耶路撒冷创建了俄罗斯在医院,而且在贝特扎尔为阿拉伯女子建立了一所中学,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为女子师范学校。为促进这些事务的进展,7年之后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再一次造访圣地。王室成员到耶路撒冷朝圣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它表示俄罗斯国家对这一地区的重视,无形中引导更多的俄罗斯教徒拥向圣地朝圣,有些人甚至留下来,扩大了俄罗斯东正教徒在当地的人数和势力。

俄国在耶路撒冷拥有的房产早于地产。在1850年代中期,随着前往圣地朝圣人数的增多,俄国驻耶路撒冷宗教使团在圣地修建供朝圣者住宿的房舍和会馆已不能满足需求。1859年,沙皇的兄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到圣地朝圣后决定修建俄罗斯三一教堂,为此在彼得堡成立了巴勒斯坦委员会,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任委员会主席。俄国在圣地的主要建筑成就应归功于该委员会。1860—1864年,巴勒斯坦委员会领导建造了俄罗斯三一教堂、俄罗斯宗教使团楼(带有四个内院的方形建筑,中央设有一个小教堂)、叶丽扎维塔男修道院和玛丽茵女修道院、领事之家和一所俄国医院。这些建筑由带有两个入口的石墙整个围成一体。以三一教堂五个圆顶为主教堂的俄罗斯建筑群非常醒目,当时的耶路撒冷居民不足2万人,楼层低矮,沙漠一直延伸到中世纪老城墙外,所以,首先映入经由圣殿山(思科普斯山)入城的朝圣者眼帘的便是俄罗斯的建筑。叶丽扎维塔男修道院为男性朝圣者提供暂居地。与建筑群的其他建筑一样,它也是带有内院的方形建筑,如果有大批朝圣者到来,可以将他们安置在室外,耶路撒冷春夏季节的气候条件完全适宜。玛丽茵女修道院是为纪念亚历山大二世的妻子王后玛利亚·阿列克桑德洛夫娜而得名的,原本计划建两层,但最终只建成一层。这是一个庞大的石头建筑,带有拱形顶棚和内院,还有附属主楼的厢房。整座建筑共有42间房屋,每间房屋里分别能够容纳4—12人。在宽敞的走廊里还安置有临时的木板通铺备用。修道院内建有公共厨房,厨房四面都是石墙,炉灶也是石头造的,顶棚用的材料则是瓦片。

建筑费用来源于国家拨款和教会捐助款两部分。巴勒斯坦委员会从1858年筹建到1864年改组,其间收入包括: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从国库拨款50万卢布,教会捐助款56万卢布,周转资金194 480卢布,加上委员会资金的利息,资金总计1 254 744卢布。在这几年内的支出有:用于建筑用地的支出68 304卢布,建筑费用668 000卢布,宗教使团小教堂的装修费36 000卢布,公共设施(围墙、门卫室、花园、水池)建设费15 000卢布,建筑工人五年的工资45 000卢布。<sup>②</sup>另外,大约有3000普特的货物需从彼得堡走海路经英格兰、直布罗陀海峡和亚历山大利亚前往巴勒斯坦当时主要的港口雅法,一趟的运费为4000卢布,将这些货物再从雅法陆路运输到耶路撒冷还需要支付近2000卢布的运费。俄国在耶路撒冷这些建筑物内所需的设备和家具,以及其他城市通过外国公司租借

① 斯卡隆:《1872年大公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游历东方和圣地随行记》(Д. А. Склон.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Востоку и Святой Земле в свите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зя Николая Николаевича в 1872 году),莫斯科2007年版,第210—211页。

② 曼苏罗夫:《1858—1864年巴勒斯坦委员会工作报告》(Б. П. Мансуров. Отчет Палестин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1858—1864),圣彼得堡1866年版,第13—15页。

并重新装修了的四个暂居房(分别在雅法、拉姆拉、海法和拿撒勒),共花费23 000卢布。此外,还为俄国在圣地的医院从法国进口了足以使用两年的全套药房设备及药物储备。据不完全统计,自1865年1月1日至1901年4月1日,俄国在圣地的建筑物接待朝圣者86 000人次,其中大部分人在耶路撒冷居住少则1月多则半年。<sup>①</sup>

随着耶路撒冷建筑项目的完成,巴勒斯坦委员会也结束了自己的使命。1864年4月7日该委员会撤销,委员会的工作移交给外交部亚洲司下设的巴勒斯坦特别小组,到1889年其职能和财产一并转交给1882年成立的皇家东正教巴勒斯坦协会,此后的工作一直由该协会负责。1907年5月21日,皇家东正教巴勒斯坦协会成立25周年,当天在彼得堡和耶路撒冷举行了隆重庆典。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述了这一天的活动。<sup>②</sup>也就在这一年,应沙皇要求,盘点了协会的财产:俄国在巴勒斯坦拥有价值将近200万卢布的地产;8个教会会馆——能容纳一万名朝圣者留住;一所医院和6个诊所;101所学校,学生10 400人。此外,25年间共出版巴勒斯坦研究专著347部。<sup>③</sup>在以后的时间里,俄国在圣地的的工作一直由皇家东正教巴勒斯坦协会负责。1905年协会主席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在一次恐怖袭击中被炸死后,公爵夫人叶丽扎维塔·费多罗夫娜继任皇家东正教巴勒斯坦协会主席一职。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为了使皇家东正教巴勒斯坦协会作为宗教机构能够继续存在下去,1917年4月9日,叶丽扎维塔·费多罗夫娜辞去主席职务。第二年的7月18日,叶丽扎维塔·费多罗夫娜死于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坑。白军攻占阿拉巴耶夫斯克后,将她以及与她一道遇难的人的尸骨从矿坑中挖出来。后来,高尔察克军败退,他们辗转整个西伯利亚,经过哈巴罗夫斯克,于1920年4月3日将尸骨运到中国北京。几个月后,遵照公爵夫人的妹妹——侯爵米利弗尔德·赫文的夫人维克多利娅·费多罗夫娜的意愿,叶丽扎维塔·费多罗夫娜以及自愿与她一道殉难的修女瓦尔瓦拉的灵柩运抵上海,从这里走海路经苏伊士运河到赛德港后最终运到耶路撒冷,先安葬在玛利亚·马格达琳教堂地下墓葬中,被尊为圣徒后迁入教堂。<sup>④</sup>

### 三、十月革命至今俄国在耶路撒冷财产的变动情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国际联盟将巴勒斯坦划给英国作为委任统治地,英国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置俄罗斯的财产。英国人将最高法院设在俄罗斯驻耶路撒冷宗教使团的大楼里(1948年英国人的牌子被犹太人的牌子替换,但是大楼的多数房间依然和从前一样被法院强制“租借”);叶丽扎维塔修道院变成了警察局;玛丽茵修道院被英国人改成了监狱,用来关押那些反对英国人的犹太复国主义激进分子,现在是犹太人抵抗史博物馆。

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时,苏联采取了支持政策,作为回报,以色列将以色列—约旦分界线处在以方国土上的俄国不动产归还给苏联。但是,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在下台前一周将俄国在圣地的绝大部分土地和房屋以45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以色列政府,但属于教会财产的三一教堂和使团大楼没有出售。

① H. H. 里索沃伊:《俄国在圣地》,《祖国历史》2003年第3期,第86—88页。

② 《沙皇尼古拉二世日记》(《Дневники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莫斯科1991年版,第368页。

③ H. H. 里索沃伊:《俄国在圣地》,《祖国历史》2003年第2期,第33页。

④ H. H. 里索沃伊:《俄国在圣地》,《祖国历史》2003年第3期,第95页。

苏联时期,国内东正教以及教会受到抑制,教徒数量和教会活动都大为减少,对国外的东正教徒也不太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放弃了东正教这种外交工具,即便在赫鲁晓夫于国内大肆裁撤教区、关闭教堂时,苏联也没有停止在国外新设东正教会馆和代表处。1954年在贝尔格莱德、1959年在索菲亚的东正教会馆内设立修道院,1958年在大马士革和亚历山大里亚城开设东正教代表处,都说明苏联政府在适当的时机还是选择东正教这种形式参与国际事务的。而耶路撒冷的东正教一直是接受苏联国家东正教会管辖的。<sup>①</sup>可以说,苏联时期在耶路撒冷的宗教存在只是沉寂,而不是断裂。

苏联解体后,俄国东正教迅速复兴,每年的7月28日被列为“罗斯受洗日”,东正教的复活节取代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东正教的主降生节取代了十月革命节。1992年5月22日,俄联邦最高会议主席团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使用皇家东正教巴勒斯坦协会这一历史名称,并建议政府采取必要措施恢复、返还属于皇家东正教巴勒斯坦协会的财产和权力。由于俄罗斯东正教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东正教自主教会,所以其他东正教会对此表示欢迎和支持。1997年在庆祝俄罗斯驻耶路撒冷宗教使团成立150周年之际,玛姆富力大橡树的地产赫弗洛被归还给俄国东正教教会。2000年1月,安东宁曾在杰里科购买的一块土地也被转交给莫斯科教会,俄罗斯在圣地的宗教与财产存在得以重续。

#### 四、俄国在耶路撒冷财产的实质与影响

以上我们系统地考察了耶路撒冷俄国财产的起源及演变情况,从表面上看,这—问题是宗教和财产问题,究其实质,则蕴涵着深刻的国际政治意义。众所周知,西方列强对落后国家的侵入往往采取宗教和文化渗透的方式,俄国也不例外,只是这种方式被长期掩盖起来了。通过上面的研究,我们看到,俄国进入中东的方式与西方列强一样,而且时间更早。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 俄国进入中东起始于基辅罗斯崛起时的公元11世纪,即接受基督教十几年之后,从时间上看,早于进入中东耶路撒冷地区的其他欧洲列强,而当时的英国、法国等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民族国家。

2. 俄国在耶路撒冷的存在表面上是宗教存在和财产存在,但实质上是政治存在。这是因为:第一,俄国在耶路撒冷的财产已从主教的个人财产转化为东正教会的公有财产,而东正教会又始终是俄国国家政权的附庸,因而,这些教产实际上就是国家财产。第二,俄国自始至终是出于政治目的安排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宗教存在的,从帝俄时期王室成员的亲自参与,到政府随意支配教会财产,再到现代俄罗斯东正教会重新要回旧有财产,无一不显露出国家政权的影子。正是由于这种特点,俄国在圣地耶路撒冷地区的宗教存在与财产存在,实际上就是政治存在。在俄国的国家势力较弱或列强博弈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俄国可以做出在耶路撒冷的财产只是宗教财产的“超脱”姿态,而当时机成熟,便将财产收归国家所有,以处理国家财产的名义直接介入这一地区的政治事务。

3. 由于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宗教存在和财产存在,俄国自11世纪初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断绝与耶路撒冷的联系。宗教与财产既是俄国进入中东的起始方式,也是其持续存在的延续方式,更是当今俄国重回中东的一个政治支点。通过宗教联系,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进入以色列,进入耶路撒冷,并

<sup>①</sup> 乐峰主编:《俄国宗教史》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页。



依托这些宗教设施凝聚起来。这些人员实际上是俄国重返中东的基础。有人员、有设施、有历史渊源,这为俄罗斯插手耶路撒冷以至中东事务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未来无论谁是耶路撒冷的主人,都不能不面对俄罗斯的存在,而俄罗斯也随时可以以宗教财产和移民的理由与那里的任何一个统治者打交道,建立起自己对该地区的影响力。俄国的有关学者并不掩饰这种倾向,他们公开地把俄罗斯在耶路撒冷的宗教和财产存在称为“俄国的巴勒斯坦”,认为这是新俄罗斯在世界大家庭中最好的“名片”,而学者的研究目的应是保护和巩固这些存在。<sup>①</sup>

4. 中国的研究者应充分认识到,以宗教为先导,通过宗教和财产的方式进入一个地区是近代西方列强扩大自身影响,追求世界控制权的惯用手段,宗教与财产在某种程度上是强国对落后国家的入侵工具。因此,对于一切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活动必须给予清醒的认识,要深刻意识到其背后的政治目的,进而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本文作者邵丽英,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西安 710069]

(责任编辑:马新民)

---

<sup>①</sup> H. H. 里索沃伊:《俄国在圣地》,《祖国历史》2003年第2期,第19页。

**Shao Liying *The Origin ,Change and Effect of Russian Property in Jerusalem***

Since the 11<sup>th</sup> century ,Russia has dispatched envoys to Jerusalem. In 1847 ,Russia sent religious missions to Jerusalem and asked them to station there. From then on ,relig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trong in the holy city. The religious missions bought landed property , built house and established the bases of Orthodox Christians in Jerusalem. Although Russia infiltrated Middle East in the form of religion ,it had a genuine purpose which was politics-based ,reflecting its ambition to control the whole world. The religion and property of Russia in Jerusalem will become a political veil for Russia to interfere in Middle East affairs. So we need to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such religion-based way to expand regional political influence while analy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Zhang Laiyi *The Muslim's Jadidism Movement in Modern Russia***

Facing the drastic disparity between Muslims and the West as well as Russians in education ,Ismail Bey Gasprinskii launched the magnificent Jadidism Movement in the 1880s , aiming at reforming traditional Islamic education ,covering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phonetic styles ,learning systems ,teaching methods ,programs of studies and curriculums ,and the selection and edi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The Jadidism Reform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Muslim education from religious education toward secular education ,lifting it to modern educational level. The Jadidism Reform Movement starting from “New Style School” w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comprehensive movement of social culture and religious reform ,and thus built a bridge for Muslims who were self-isolated for ages to step out of the Middle Ages and march onto the modern world.

**Li Dan *On Gag Rule Passed by the U. S. Congress that Prohibited Speech of Abolitionists from 1836 to 1844***

The Anti-Slavery Society of America sent many petitions to the Congress for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in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in the 1830s. The abolitionists' activities including “petition to the Congres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free speech in the U. S. As a response to more and more abolitionists' petitions ,the U. S. Congress passed a gag rule to prohibit sena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discussing these petitions in 1836. The gag rule not only violated congressmen's free speech rights as stipulated in U. S. Constitution ,but also